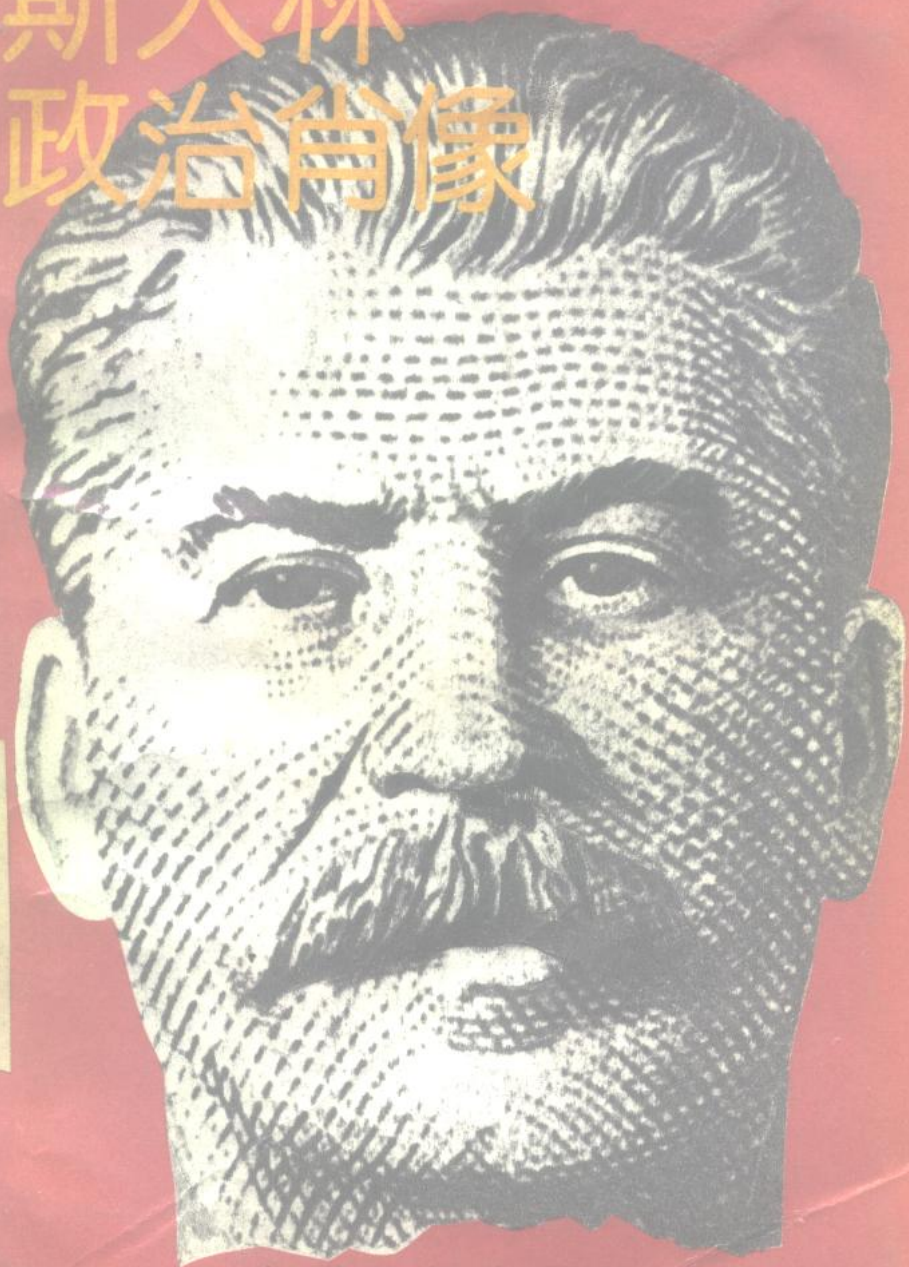


# 斯大林 政治肖像

〔苏〕德·沃尔科戈诺夫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 斯大林政治肖像

〔苏〕德·沃尔科戈诺夫 著

陈启能 李巍岷 井勤荪 等译

陈启能 校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9·北京

## 斯大林政治肖像

〔苏〕德·沃尔科戈诺夫著  
陈启能 李巍岷 井勤荪等译

\*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门头沟印刷厂激光照排 中央党校印刷厂印刷

\*

788×1092毫米 1/32 18.75印张 470千字

1989年5月北京第1版 1989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0000册

ISBN7-80014-613-8/D·054

定价：7.10元

# 前 言

## 斯大林现象<sup>①</sup>

只有斯大林自己才了解自己的一切。他不喜欢中间色调。要么是白色的，要么是黑色的。毫无疑问，他非常希望，在写给子孙后代看的他的传记中，明朗的色彩占着统治地位。古罗马曾有一条“记忆判罪律”，按照这条法律，凡现任最高统帅不满意的東西均應忘却。我不知道，斯大林是否料到有这条法律存在。然而，我們知道，这条法律只不过强调说明了对人的记忆作出规定的各种尝试是徒劳无益的。记忆的生存（或消亡）完全是按照另外的规律，即记忆本身的规律进行的。历史的深渊深邃无底。然而，并非所有的人都通过那张结在遗忘深渊之上的记忆之网的网眼“坠入”深渊。象斯大林这样的庞然大物毕竟有机会载入史册。

目前进行的积极过程不仅要革新现在，而且还要“修复”和恢复过去。这不能不使我们大家感到欣慰。于是，斯大林的形

---

①译者按：《斯大林现象》一文是本书作者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为本书写的前言，发表于苏联《文学报》1987年12月9日。但苏联《十月》杂志在连载本书时，却没有发表这篇前言。现特地把这篇前言译出，附在本书中译本之前。这篇前言的译者是朱成光。

下面是苏联《文学报》在发表这篇前言时写的按语：

“政治传记体裁在我国文坛上显然是不受推崇的。我们至今还没有一部关于斯大林的严肃认真的传记特写。然而，对于这样一部作品的需要则是毫无疑问的。哲学博士德·沃尔科戈诺夫教授多年来从事收集写斯大林传记的资料。在学术界，他是著名学者，写过近20部关于军事理论和政治问题的专著。此外，他还写过一系列哲学政论文体裁的书籍。这里介绍给《文学报》读者阅读的，是作者为《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一书所作的作者前言的缩写。德·沃尔科戈诺夫打算于1988年将该书写完。”

象也许成了社会对历史的兴趣在理智和感情上关注的焦点。我认为，在我国历史（俄国史和苏联史）上，没有比斯大林更矛盾的人物。他一人所受到的赞扬和指责都足够整整一个罗马军团的历史人物来承担。

漫游未来是困难的，是飘忽不定的。漫游过去也不轻松。这永远象费尔巴哈非常中肯地指出的那样，是令人不安的、使人激动的“对心脏的刺激”。斯大林是历史上最复杂的人物之一。不管我们是否愿意，这样的人物不仅属于过去，而且属于现在，属于将来。他们的命运永远是对存在、时代和良心进行思考时滋养世界观的食粮。在开始研究斯大林时就可自然而然地得出的一个结论是：这个人物的历史就象在聚光点上一样清楚地照出了他那个时代的最复杂的辩证法。当时的条件是那样复杂，作为人民和党的领袖的人物也是同样复杂的。如果我们在真理面前，在历史面前是诚实的，那就不能不承认约·维·斯大林对于为争取社会主义和捍卫社会主义的斗争所作的无可争议的贡献，也不能不承认他的不可饶恕的政治错误和罪行（其表现是毫无根据地镇压成千上万无辜的人）。斯大林和党的领导核心在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中坚持和捍卫了列宁主义，为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良好条件。可是，正当最困难的时刻似乎已经过去（从党内斗争来看），在创造新事物的许多领域已经取得重大成绩的时候，却产生了被斯大林“神圣化了的”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这一严重错误的政治论点。而这就意味着，无产阶级专政总的来说越来越突出的不是创造方面，而是惩罚方面。因此，对于斯大林这个人物的评价随着真正的历史真相的阐明而有重要变化，是并非偶然的。假如我们把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 1949 年 12 月庆祝斯大林 70 寿辰的贺词同尼·谢·赫鲁晓夫于 1956 年 2 月 24 日夜间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戏剧性报告的论点加以对比，那就可以看出，对于

党的领袖的评价事实上是截然相反的。这两种评价实质上是由同一一些人作出的，只不过相距几年时间。而后，社会觉悟的过程就进入了某种暂停状态。

一提到斯大林的名字，在许多人的脑海里首先浮现出来的就是悲惨的1937年，是镇压，是蹂躏人格。在社会气氛中，开始令人讨厌地闪现着肉眼看不见的主宰人们生死命运的瓦尔基利亚女神们<sup>①</sup>的阴影了。是的，所有这一切都是有罪的，这些罪行是不可饶恕的。但是，我们记得，同样也是在这些年代，建起了第聂伯水电站和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涌现出帕帕宁、<sup>②</sup>安格林娜、<sup>③</sup>斯达汉诺夫<sup>④</sup>和布瑟金<sup>⑤</sup>等英雄人物。我们今天的全部事业的基础恰好是在这些年头创立的。在伟大卫国战争中能够坚持下来并战胜法西斯的苏联人的精神正是在这个时期得到了最高的发扬。因此，在谴责斯大林的罪行时，怀疑社会主义的实际成就和社会主义的具有原

---

① 瓦尔基利亚女神是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女神。她们主宰战争胜负，并将英勇阵亡将士的灵魂引入瓦尔加拉宫筵以酒宴。在古斯堪的纳维亚语中，Valkyrja的本义是“选择阵亡将士者”。——译者注

② 帕帕宁（1894—）——苏联北极考察家，地理学博士，曾领导苏联第一个“СП—1号”漂流考察站（1937—1938年），两次获苏联英雄称号。著有《冰上生活日记》、《冰与火》等。——译者注

③ 安格林娜（1912—1959年）——苏联第一个妇女拖拉机队组织者。两次社会主义劳动英雄。——译者注

④ 斯达汉诺夫（1905/06—1977年）——苏联群众性生产革新运动（斯达汉诺夫运动）的首创者。1935年当风镐采煤工时创造采煤纪录。社会主义劳动英雄。——译者注

⑤ 布瑟金（1907—）——苏联汽车工业中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发起人。1935年在高尔基汽车制造厂当锻工时，创造了锻造曲轴的世界纪录。社会主义劳动英雄。——译者注

则意义的潜力，从政治观点来看是错误的，从道德来说是不正直的。在评价斯大林或其周围的亲近人物时，机械地把这些评价转移到党的身上，转移到亿万普通人身上，也是不正确的。普通人对革命理想是真理的信念并没有动摇。

老布尔什维克 А·И·库普佐夫遭受悲惨的苦难，在许多劳改营呆过，历尽各种非人的凌辱和磨难。在经受这些苦难之后又过了几十年，今天他依然坚定地说：“我们这些由于当局专横武断而被关进劳改营的人，人数很多。但是我甚至一次也没有，我要特别重复一下，一次也没有，产生过有损于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制度和我们的理想的想法。我只是把骇人听闻的非正义同某些具体人的某些悲剧性错误和失误联系起来。我所有的难友都是这样想的。当我们听到从外边传来的关于新工厂开工和契卡洛夫<sup>①</sup>飞行的消息时，我们感到由衷的高兴。后来又为战争初期的令人震惊的失利而十分痛苦。……监狱没有，也不可能从精神上使我们同祖国疏远，也不可能使我们同自己的事业疏远。我们即使在西伯利亚劳改营铁丝网的后面，对自己的事业仍然继续忠贞不渝。”

不应该用算术的办法来评价历史。例如，提出这样的问题：斯大林的功劳大还是罪行大？这种问题的提法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因为任何功劳都不能为惨无人道开脱罪责。在理解政权机制变形的根源和原因方面，问题要复杂得多。怎么会发生下面这样的情况呢：伟大的事情和卑鄙的事情同时并存，丑恶竟伪装成了善良？为什么会发生许多人的社会蜕化？悲剧是不

---

<sup>①</sup>契卡洛夫（1904—1938年）——苏联飞行员，苏联英雄（1936年），曾创造过许多飞行特技。1936—1937年完成莫斯科——远东乌德岛的不着陆飞行。后又与别人一起完成莫斯科—北极—美国温哥华的不着陆飞行。因飞机事故遇难。——译者注

是不可避免的？为什么社会保卫机构没有“起作用”？这些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经常出现在我们的报刊上，反映了苏联人的政治修养和历史修养正在迅速提高。在党的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已经注意到了这种提高。在许多情况下，特别是一些对祖国历史只有概括了解的年轻人，由于一些主观评价截然相反的论断，因而产生了精神上的焦急不安，而这种焦急不安又可能引起社会虚无主义和对我们的价值的不尊重。解除认识上的饥渴的最好办法是了解真相。

列宁分析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途的方法论和他对革命领袖的政治品质和个人品质的评价，是塑造哲学人物和政治人物肖像的出发点。斯大林一生都记得弗·伊·列宁在1922年12月写给党代表大会的便函中，把他和托洛茨基称作“杰出领袖”，<sup>①</sup>然而他任何时候也不会忘记列宁关于他的复杂气质和乖僻性格的十分坦率和深刻的评价。他也不能顺从地接受列宁把布哈林称作“全党喜欢的人物”。<sup>②</sup>只要对斯大林的一些言论作一番研究便会发现，他曾不止一次地，然而极其谨慎地、咬文嚼字地、拐弯抹角地对列宁的评价提出异议。例如，在一次讲话中，他在思想上以列宁为辩论对手，说道：“我们爱布哈林，但是我们更爱真理，更爱党，更爱共产国际。”<sup>③</sup>这句话恐怕可以反映出整个斯大林：他既忠实于思想，又狡猾、机敏。在这篇讲话中，总书记把列宁关于“斯大林太粗暴”<sup>④</sup>的结论解释为“只是对敌人粗暴”。……在分析斯

---

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9页。——译者注

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9页。——译者注

③见《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2页。——译者注

④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0页。——译者注



大林现象时求助于列宁，你会一次又一次地得到证实：列宁思想的光芒仍和从前一样在我们前面闪耀。这不单纯是英明而深刻的真理所特有的，而且还是预言性真理所特有的。

最近几年，为许多历史人物，例如恺撒、拿破仑、丘吉尔、戴高乐以及其他一些总是处在历史地毯表面上的人物写了政治传记。特别是在我国，甚至还为希特勒这种人类凶恶的敌人出版传记。对于这样的事人们不觉得有失体面，不认为有什么不合适。可是，至今还没有一本约·维·斯大林的传记。国外却已有几十本关于斯大林的书。今天在我国填补这一空白的，是关于此人活动的个别侧面和方面的大量文艺和历史作品。它们的出现显示了久旱后一场甘霖的效应。毫无疑问，还会有历史学家们关于斯大林、布哈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以及党和国家其他活动家的更为严肃的科研著作出现。

这样的兴趣之所以会产生，原因之一在于：斯大林的生命，按历史尺度来说，是不久前才中断的，至今还不到40年。这就是说，他的命运是同现在还活着的人以及离他们很近的前辈密切相关的。

对于描写斯大林生活的作品之所以会有经久不衰的兴趣，另一个原因在于：对社会价值和一般人的价值，诸如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正义、真理、道德理想等有了新的理解。停滞年代<sup>①</sup>再一次表明，思维的教条主义只能建造空想的哲学庙宇。在这样的庙宇里，一切应当起“永恒之物”的作用。可是，除了变化以外，大概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之物。教条主义的盲目性是危险的。它能把意识形态变为宗教。教条主义把尘世的一切欢乐都推到“明天”，而明天又推到“后天”。我们的社会已经进入革命更新的阶段。这个阶段首先涉及的便是社会意识。

---

<sup>①</sup>指勃列日涅夫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时期（1966—1982年）。——译者注

根植于斯大林独裁统治的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成为批评和否定的主要对象，这不是偶然的。

最后，人们对曾在政权金字塔顶端呆过 30 多年的这个人的一生之所以一直感兴趣，还有一个原因（当然，此外还有更多的原因）。他不是象列宁那样和人们并肩而立的，不是象列宁那样站在人们中间的，而是站在人民头上的。苏联人虽然读过无数吹捧他的文章，看过他的大量肖象和雕象，读过他的大量著作，可是实际上关于斯大林是毫无所知的。战后出版的那本传略没有作者，只有扉页上列举的几位“编者”：格·费·亚历山德罗夫<sup>①</sup>、马·鲍·米丁<sup>②</sup>、彼·尼·波斯佩洛夫<sup>③</sup>等。这本由斯大林亲自校订的传记，概略地叙述了他个人的英雄业绩，然而这本传记却缺乏关于人的本身的描写。

诚然，斯大林的某些同时代的人曾作过一些描绘其政治肖象的尝试。例如，叶·米·雅罗斯拉夫斯基<sup>④</sup>在战前曾出版过一本书《关于斯大林同志》。书中除了对斯大林大加吹捧之外，还正确地指出：写斯大林，这就是说要讲述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过程中党的斗争的一切波折。卡尔·拉狄克<sup>⑤</sup>在其《肖像与抨击文》（1933 年）一书中，以纵情歌颂救世主的调

---

①亚历山德罗夫（1908—1961年）——苏联哲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译者注

②米丁（1901—）——苏联哲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译者注

③波斯佩洛夫（1898—1979年）——苏联国务和党务活动家、历史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曾任苏共中央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等职。——译者注

④雅罗斯拉夫斯基（1878—1943年）——苏联国务和党务活动家，苏联科学院院士。曾任苏共中央委员等职。——译者注

⑤卡尔·拉狄克（1885—1939?）——共产国际早期的领导人。生于西班牙。曾任共产国际书记等职。1936 年因参与托洛茨基的活动被捕，判处 10 年徒刑，后死于狱中。——译者注

子写了一篇长文。可是，拉狄克的这种对领袖的有失体面的歌功颂德，并没有使他免遭厄运。这类著作的科学价值是不大的。

人的生命就象北方的夏天一样在迅速消逝。看来，人的生命也象一堆篝火，起初是火星，然后是轻盈而欢快的火舌，猛烈的火焰，柔和的热气，微弱的闪光，逐渐熄灭的木炭，最后是冰凉的灰烬……伟人和非伟人迟早将要得到的都是不存在。而这是必定来临的永恒的夜晚，是永远不会再来的白昼。这是一条对所有的人都不讲情面的真理。斯大林懂得这一点。我国历史上的许多“空白”点以及许多在编年史上被歪曲甚至被撕掉的篇章，都是在斯大林的参与和他的战友们的协助下造成的。这是一个困难。

另一个困难则具有比较一般的性质。问题在于：一个具体的人的意识就是一个完整的微观宇宙，就是一个会随着人的死亡而消失的巨大的神秘莫测的世界。我们永远不会了解每一个已经死了的人，可是这种认识的可能性却又是无限的。能够说明斯大林的思想 and 想法的，不是他的文章、笔记和决议，而是在社会实践、功绩、业绩以及令我们痛心的他的罪行上物质化了的那些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说，意识的秘密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不过要看到这些意识的秘密是以什么“为营养的”，用什么表现出来的和靠什么激励起来的。我们周围的多色彩、多音弦、多灾多难的人类生活的世界，便是猜破人的（其中也包括斯大林这种人的）意识的秘密的主要诀窍。不过，有时对斯大林的行为作科学分析反而会导致对斯大林的某些行动解释不通。

例如，斯大林知道列宁同布哈林有亲切的关系。斯大林本人多年来同布哈林及其家庭保持着私人友好关系。布哈林在帮

助斯大林同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中曾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斯大林不可能不感觉到，指控布哈林从事间谍活动和搞阴谋等显得十分滑稽可笑。布哈林是有高度智力文化的人，善于尊重论据。当他确信，他的从容不迫的社会主义发展纲领可能导致崩溃，因为历史没有给我国留出“摇摆”的时间以后；他老实地承认自己错了。他并不是简单地认错，而是积极地参加实现党的方针。可是，这并没有妨碍斯大林实际上批准对这位最有名望的党务活动家实行镇压。这实际上是镇压一位和党员们亲近的同志。……怎样才能解释和理解这样的行动呢？

还是在几年以前，我在准备写一篇关于约·维·斯大林的哲学传记特写时，不知为什么不知不觉地对有关马其顿王<sup>①</sup>、恺撒<sup>②</sup>、克伦威尔<sup>③</sup>、伊凡雷帝<sup>④</sup>、彼得大帝<sup>⑤</sup>……等人的著作开始感兴趣。我很想知道这些“领袖”、独裁者、统治者和其他专制型的领导人的心理状态。虽然我懂得，任何历史类比在这里都是有危险的，可是我还是想谈一点初步意见。对于享有无限权力的人来说，离开了民主监督，绝对正确感、个人无限优越感、为所欲为、过高估计自己的能力和条件都会成为习以为常的事。通常这些人在人们中间是无限孤独的。虽然斯大林（正如现在已经调查清楚的）同别人单独交谈的情况非常少

---

① 马其顿王（即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公元前356—前325年）——国王非力二世之子，由亚里士多德教养成人，曾建立世界最大的古代君主国。——译者注

② 恺撒（公元前102/100—前44年）——罗马独裁者。——译者注

③ 克伦威尔（1599—1658年）——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活动家，独立派领导人，1653年建立军事独裁专制制度。——译者注

④ 伊凡雷帝（1530—1584年）——即伊凡四世，俄国第一个沙皇。——译者注

⑤ 彼得大帝（1672—1725年）——俄国沙皇。在位期间曾实行一系列重大改革，加强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史称彼得一世的改革。——译者注

(他总是同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或马林科夫、贝利亚等人在一起)，然而他在内心里还是极度孤独的，没有人可和他建立关系，没有人可进行辩论，没有人可听他证明什么，也没有人可听他说明自己是正确的……身居高位的孤独状态和在现实中日益僵化的无限权力，耗尽了他的感情，把他的智力变成了一架冷冰冰的计算机。每一个步骤都会立刻成为“历史性的”、“改变别人命运的”、“决定性的”步骤，它们就逐渐扼杀了这个人物身上的人的特性。

他一辈子都力图（而且并非没有成绩！）把自己的一个弱点变成力量的标志。还在革命时期，遇到必须到工厂、团队、街头集会和人群中去的时候，斯大林就会产生一种内心没有把握和惊慌的感情。当然，他善于掩饰这种感情。斯大林不喜欢，而且看来也不善于在大庭广众面前作漂亮的演说。他的话简单明了，但是没有思想的奔放，没有警句和讲坛上应有的慷慨激昂。浓重的口音、拘束而单调的言语，使他的发言没有表现力。这不是偶然的：在列宁周围的人物中，斯大林在群众集会、各种会晤和游行示威时发表演说的次数比别人少。他宁愿起草指令和指示，写论文和短评，就某些政治事件发表报刊评论。例如，1917年3月中旬从流放地归来以后，斯大林在半年时间里就在《真理报》、《士兵真理报》、《工人和士兵》以及其他出版物上发表了60多篇论文和短评！从文学风格的观点来看，他是个中等的政论文作家。然而，不能否认他作出的结论有一贯性、明确性和毫不含糊的坚决性。在斯大林的出生地哥里，中午的阳光几乎是垂直照射的，没有一点儿背荫的地方。在斯大林给报纸写的这些文章中也是这样：所有的文章全没有中间色调。

后来，斯大林习惯于走上党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讲台了。可是，这时的情况已有所不同：人们要在紧张的安静中来

聆听他那不大的、心平气和的声音，并准备以狂飙般的掌声继而转为热烈的欢呼声来打破这种安静。斯大林通常尽量保持不直接同群众接触：他既不到工厂去，也不到集体农庄去；既不到各个共和国去，也不到前线去。例外的情况很少。金字塔的顶部间或响起领袖的声音。在金字塔脚下，千百万人诚惶诚恐地洗耳恭听。领袖把他那不与人交往、孤家寡人的孤僻性格变成了受人崇拜和享有特权的属性。

我重复说一遍：我不是历史学家。我相信会出现一些更详尽的史学著作。然而，我是个哲学家，因此我力求坚持历史的东西与逻辑的东西的统一这一原则。作为分析和结论的基础的，首先是列宁的著作、党的文件和一系列档案材料。譬如说，涉及军事方面的活动时，我看了国防部档案中许多有趣的、没有发表过的文件原本。甚至在这些文件上刚一看到斯大林的一些决定，便发现作这些决定的人是非常矛盾的。例如，斯大林看了一份报告，报告上说，为了掌握夜间飞行而进行的训练，使空军伤亡惨重。国防人民委员在报告中指出，造成惨重伤亡的原因是空军领导人对组织涣散和纪律松懈的现象姑息放纵。在当时，这样的评价无异于一份判决书。斯大林的批示却是：应当更好地训练飞行员，对“姑息放纵纪律松弛”负有责任的空军领导人则被派往军事科学院去学习。可是同时，在别的文件上作出的决定却大不一样，比这要严厉得多。

仔细观察那些保存完好的、通常是用红色铅笔或蓝色铅笔书写的、虽然有些潦草却易于辨认的斯大林的批示，你就会思索一个问题：这个人的非理性的深刻原因究竟何在？可能是由于他在自己生命的早期接受宗教教义的营养太多？也许是由于一种特殊的智力上的嫉妒（他在伦敦和斯德哥尔摩的党代表大会上听取列宁、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等人的

精彩报告时，曾有过这样嫉妒心情)?或许这种非理性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早在十月革命以前在他身上就已产生的残酷无情?列宁在1922年12月30日的一封信中指出，斯大林的性格有暴怒的特点。列宁还写道：暴怒“通常在政治上总是起极坏的作用”<sup>①</sup>。在十月革命以前，斯大林曾7次被捕，5次逃跑。从19岁起，他经常隐藏起来，经常执行党委会交给的任务，经常被捕，经常改变姓氏，搞假护照，抢劫别人的钱财为党筹措经费，经常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监狱不能长期关住他，越狱后又重新隐藏起来。然而，他从来也没想到过到国外去。

我读遍了斯大林在国内的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论敌的著作。这些人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所有这些人都曾既是列宁的战友，又是列宁的学生。其中任何一个都不承认自己是斯大林“提拔的人”，可是后来，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以及其他新活动家在占据他们的位置后却公开承认自己是斯大林提拔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是按照古代独裁者的规律行事的，因为由他自己提拔上来的人更忠诚，不会觊觎第一把交椅。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许多活动家20年代时在党内的知名度高于斯大林。应当说，其中某些人是非常富有成果的。例如，列·托洛茨基在1927年以前已经出版了17卷文集。这位政治家精力充沛，虽然没有小说家的天才，却创作了自己的“著作”，经常在历史的镜子前面卖弄风骚，力图证明自己对党的领袖地位的垂涎是正确的。我读过他的几卷通信集，非常惊奇，他多么关心的是，关于他自己应该给

---

<sup>①</sup>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50页。——译者注

后代留下些什么。他历次讲演时所收到的赞扬信和便条、接见过的外交家的名单、报刊上关于他所采取的步骤和行为的反映，——所有这些都仔细地钉在一起并很好地保存着。托洛茨基是准备夺取列宁死后的领袖地位的。

斯大林比别人更多地充当了托洛茨基批评之箭的直接或间接的靶心。的确，主要的反苏、反斯大林著作是在他被驱逐出苏联之后写的。大家知道，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评语是：“我党最卓越的庸才”。不过，托洛茨基几乎从不掩饰他以智力天才自居的想法，经常使用类似的词语来贬低自己的论敌（例如，托洛茨基1924年谈到季诺维也夫时，把季诺维也夫称作“纠缠不休的庸才”；他还把王德威尔得<sup>①</sup>称作“杰出的庸才”，把策烈铁里<sup>②</sup>称作“有才华而诚实的庸才”等）。在被驱逐出苏联以后，托洛茨基只剩下一种永恒的狂热：对斯大林的仇恨。直到生命结束。世界上谁也没有象托洛茨基那样写过这么多针对斯大林的尖刻的、恶毒的、侮辱性的、漫画式讽刺的、故意损伤对方自尊心的东西，这就更加表明了他自己：原来他的斗争并不是为了真理，而只是为了自己——一个没有上任的独裁者。

当1924年1月21日这个悲惨的日子来临时，斯大林口授了一份电报。内容如下：“转告托洛茨基同志。1月21日6时50分，列宁同志突然逝世。呼吸中枢麻痹后，接着就是死亡。葬礼将于星期六即1月26日举行。斯大林。”在签署这份电报时，斯大林懂得，恰好是现在他必须同托洛茨基进行一场争夺领袖地位的残酷无情的斗争。但斯大林当时是否知道，当他战胜托洛茨基以后，会出乎他意料之外地怎么也无法同托洛

---

①王德威尔得（1866—1938年）——比利时社会党人，改良主义者，曾任第二国际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主席。——译者注

②策烈铁里（1881—1959年）——孟克维克首领之一。——译者注



茨基“分手”？正是托洛茨基赞扬过首长—官僚作风的方法，即强制的方法，“拧紧螺丝钉”的方法，而这种方法却要被斯大林采用。后来的悲剧的根源之一是否就在于此？其他的根源又何在呢？我只能说出下面这些。

有一个似乎是带偶然性的原因，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以后，在1922年4月3日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决定设立总书记的职位。但这个岗位并不是关键的、主要的岗位，否则列宁大概会当第一任总书记的。总书记要管书记处的日常工作。列宁已经生病了。根据加米涅夫的建议（显然，得到了列宁的赞同），确定由斯大林担任这一职务，因为斯大林早就表现了对机关工作的爱好。在这项任命以后不到一年，列宁于1923年1月4日对那封著名的《给党代表大会的信》的补充里，建议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想个办法”<sup>①</sup>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只要再过几个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可以看清楚这个当总书记的人并在他身上发现可能在将来成为危险的某种东西。领袖的去世妨碍了这个愿望的实现。但是由此又追溯出另一个原因，一个特殊的原因：列宁的意志没有执行。中央委员会和十三大的代表们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贯彻到底。好心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当时！）对斯大林的让步，使党在后来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不过，根据材料来看，斯大林知道列宁的信的内容以后，甚至打算提出辞职。为了尊重客观，应当说，斯大林在1924年只不过是许多领导人之一，谁也没有把他看成是即将来临的恶魔。

但是，后来发生的一些悲剧的主要原因是不同的，这个原因也是在于继承者没有实现列宁的方针。在领袖的最后一些信

---

<sup>①</sup>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0页。——译者注